



母亲的泪光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郑中天

1955年，我从石桥铺小学毕业，参加小升初考试后，接到重庆市第二中学的录取通知书，便回到中兴路坎井街的家。那年的暑假，我有点忘乎所以，整天和小伙伴玩得亦乐乎，有时连吃饭都忘了。外婆虽骂声不断，却没有动手打我，可能是她觉得我已是中学生，过了暑假就要去学校住读，所以网开一面。

开学时去二中报到，母亲委托舅妈陪我去，毕竟我只有12岁，母亲并不放心。那年二中初中部招了八个班，报到时学校按年龄分班，我被分到年龄最小的初58级1组。刚住进学生宿舍不久，兴奋感很快就消失在恐惧中。

我们住的宿舍靠近果园，享受鸟语花香的同时，也遭到蚊子的疯狂袭击，幸好妈妈给我准备了蚊帐，才避免被蚊子叮咬。蚊子虽飞不进蚊帐，但还有更可怕的臭虫，寝室双人床都是使用多年的旧木床，衔接木床的斗榫孔，就是臭虫藏身之地，我晚上被臭虫折磨得够呛，身上被咬的红点奇痒难忍。有的同学半夜被咬醒，坐在床上大声哭泣，哭声吵醒室友的同学，有人跟着哭，整个宿舍闹翻了天。

学生宿舍半夜闹臭虫的事，传到校长张富洁耳朵里，她限总务主任一月内消灭臭虫。总务主任这下着急了，赶忙找人开会研究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于是有人提议在宿舍区修一个能烧开水的大灶，锅上砌一个能放下双人床的池子，池子里的水烧开后，把床抬进去浸泡，床缝里所有的臭虫就都难逃灭顶之灾了。这个主意好，得到张校长的赞同。一个星期后，池子修好了，按总务处的安排，分年级轮流把床抬到池子里煮。一张床被校工按进开水池里煮两三分分钟就够了，没煮多少张床，池子里的水就变成了褐色，水面上漂浮的臭虫一坨一坨的，用漏瓢捞起来，倒进桶里臭不可闻。学生宿舍的双人床，经开水浸煮后，

同学们晚上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。

1956年1月，重庆下了一场大雪，这场大雪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。那是我到二中住读的第一个学期，第二天就要期末考试，上晚自习时，窗外突然飘起了雪花。有些雪花飘到教室窗子玻璃上，第一次看见雪花的真容，我便被大自然的神奇所折服，虽然它瞬间融化成水，但雪花美丽的六角形外貌，从此便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回寝室的路上，雪花仍在灯光下飘着，我好奇地用手去接，落到手心的瞬间成了冰凉的水渍。第二天一大早就醒了，急忙穿好衣服，溜出寝室门一望，雪虽停了，但整个虎头岩成了白雪的世界。顺着积雪的石梯，我来到洗手池旁边的老杨树下，见雪花给杨树穿了一层美丽的衣裳。什么叫银装素裹？什么叫雪绒缠枝？百闻不如一见，那种冷色调的美丽，难以用言语形容。

就在我惊讶这难得一见的雪景时，学校敲起床钟的老校工来了。他双手放在嘴边哈了一口热气，又搓了搓，然后解开系在树上的绳子，准备敲起床钟。我抬头看见吊在树上的大铁钟，上面也积了厚厚一层雪，当老校工拉动绳子敲响钟声的那一刻，雪花被纷纷震落下来。我跑到大树下面，迎着树上落下的雪花又蹦又跳，头上、身上和脖子里顿时落满了雪，感觉兴奋异常。雪后的拂晓，空气特别清新，校园的钟声传得很远很远，整个虎头岩余音缭绕，所以我写下了“老树钟声惊晓雪，红楼惊梦绕余音”的句子。

这天是期末考试的日子，吃完早餐，心想离考试还有半个多小时，顾不得身上寒冷，匆匆赶到虎头岩下面的果园，那地方的积雪特别厚，已经有十几个同学在那里堆雪人打起了雪仗。我虽个子矮小，但敢和高年级同学打雪仗，雪打在脸上很冷，但一点都不痛。



母亲当时在沙坪坝区人民银行工作，见天寒地冻，怕我着凉，早上五点多钟就起床，赶早班车把亲手织的毛衣送到学校。在龙隐路车站下车后，到二中还有一段上坡路，这条路母亲当年读大学时不知走过多少回，所以她到二中不需要问路。找到教室后，母亲不见我人影，一位女生趁机告我的状。

母亲是性情中人，怎能容忍儿子在如此好的学习环境中不珍惜宝贵时光。考试的预备钟声响过之后，我才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室门口，看见母亲站在那里，愤怒的眼里闪着泪光，我诚惶诚恐地问了一句：“妈妈，您怎么来了？”“谁是你妈妈？我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！”母亲把手中的毛衣扔到我脸上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走进教室，我躲开女生们幸灾乐祸的目光，心想只要期末考试成绩好，到时谁还敢嘲笑我。脱下身上的棉袄，穿上妈妈为我织的

毛衣，再套上棉袄，身上的寒气

立即就消失了。试卷发下来，我埋头做题，发现考题并不难，越做心里越轻松，母亲的泪光被我渐渐淡忘。

期末考试最后一天，我收到母亲寄来的一封信，打开一看惊得目瞪口呆，母亲在信中宣布与我脱离母子关系。我心里有些发慌，难道就因为我考前打雪仗这点小事，母亲就不要我了？期末考试完毕，学校放假，我和同学走路回家，路上寒风劲吹，穿着母亲织的毛衣，一点都不觉得冷，母亲的温暖仍然在心头。回到中兴路坎井街的家，还不到一个星期，期末考试的成绩单就寄来了，八门功课5分和4分各占一半，这成绩在班上属中等偏上。母亲回家看见成绩单，再也不提脱离母子关系的事了。

中学的六年时光，特别是初中阶段，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唯一后悔的是，我不该在错误的时间，因贪玩差点耽误考试，让自尊心极强的母亲遭到羞辱。小时候顽皮的我常让母亲伤心，但这一次却伤透了她的心，所以她才会含着眼泪写那封恨铁不成钢的信。

几十年过去，每逢清明扫墓，跪在母亲的墓前叩头时，童年的往事便会一件件涌上心头。站在南岸观音山的墓园，远眺母亲出生地临江门，以此表达我对母亲深深的歉意。

记忆中的那碗黄凉粉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友才

一个周末，我去逛巴蜀古驿道上的荣昌老城，街边一家小吃摊吸引了我。那金黄透亮的黄凉粉，泛着油润光泽，犹如一方方温润的玉，静卧在摊主的菜板上，散发着淡淡的豌豆香。我不禁触景生情，想起了儿时在街边小摊吃过的那碗黄凉粉。

记得我八岁那年，跟随妈妈去镇上赶场。走到一个卖黄凉粉的摊子时，我两条小腿如被钉住一般，再难往前迈动半步。妈妈拽着我的小手，叫我：“快走。”我却仰头看向摊子，嚷着：“妈妈，我要吃那个。”

妈妈停了下来，走到摊位前问道：“黄凉粉好多钱一碗？”摊主说：“五分钱。”依稀记得，摊主是一位穿碎花布短袖、腰间系白色围裙的嬢嬢。妈妈掏出五分硬币递过去，卖黄凉粉的嬢嬢便动作麻利地切下一块粉，切成筷子粗细的条状，即刻放进碗中，浇上红亮的熟油辣子和浓稠的盐苕，撒上几粒翠绿的葱花，随后端给妈妈。妈妈拿起一双筷子，轻轻搅拌几下，叫我坐在摊位旁的小板凳上吃。妈妈坐在我身旁看着我吃，感到无比欣慰。

我吃得咂嘴嚼舌，满嘴油光，一碗黄凉粉很快就下了肚。妈妈摸摸我的头问道：“好吃不？”我赶紧说：“好吃。”

之所以记忆犹新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吃黄凉粉。那碗黄凉粉，味道辣辣的、麻麻的、香香的。那味道，是儿时的味道，也是童年的记忆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缺粮少吃。那年头，对于一个农村娃来说，能吃上一碗黄凉粉，那是很奢侈的事。儿时，我不明白，妈妈为啥只买一碗黄凉粉。长大后，我才懂得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生活过得苦巴巴的，黄凉粉自然是不能想吃就吃的。

小时候，时常会有嬢嬢挑着黄凉粉的担子，穿行于乡间村陌，一路吆喝着“黄凉粉、黄凉粉……”黄凉粉的叫卖声，曾是儿时最动人的音符，每当那悠长的叫卖声传来，我便急急冲出家门。卖黄凉粉的嬢嬢刚把担子歇在院坝上，一群小伙伴便纷纷围拢过去。尽管个个身无分文，但就算是围着黄凉粉担子转一圈，闻一闻黄凉粉的香味儿也满心欢喜。

长大后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忘不了妈妈买给我吃的那一碗黄凉粉。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参军到了大西北。身在他乡，吃不到故乡的黄凉粉，我总是心心念念。每次回乡探亲，我都会特意去找一家卖黄凉粉的小吃摊，寻找儿时记忆。我最喜欢坐着小板凳，在街边

吃黄凉粉的感觉。那感觉，仿佛能够唤醒我心中深藏的情感记忆，带给我无尽的温暖。

时光流转，那一碗黄凉粉却如影随形，萦绕在我记忆深处。如今，生活条件好了，吃黄凉粉不再是奢侈的事。我隔三差五，仍要去寻一碗黄凉粉来吃。然而，无论碗中粉块儿多么清爽，调料多么喷香，却总也找不回童年那种五分硬币换来的滋味。那金贵的五分硬币，连同嬢嬢那悠长的叫卖声，皆已消逝在岁月的长河里，杳然难觅。

我在失去与重拾之间，寻找童年的记忆。故乡的黄凉粉，对于我来说，不仅仅是一口美食，更是一种心灵的寄托。那碗温暖的黄凉粉，长久存储在我的脑海里，深深刻在我生命里，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。

